

中国国情调研丛书·村庄卷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survey Series • Vol. Villages

主 编 张晓山

蔡 昉



中国村寨基金第一村

**The Story about the First Village
to Establish the Rural Revolving Fund**

徐鲜梅 苏穗 刘文 管毓和 著

中国国情调研丛书·村庄卷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survey Series • Vol. Villages

主 编 张晓山

蔡 昉



中国村寨基金第一村

The Story about the First Village
to Establish the Rural Revolving Fund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村寨基金第一村 / 徐鲜梅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 - 7 - 5161 - 1156 - 7

I. ①中… II. ①徐… III. ①乡村 - 基金 - 投资 - 研究 - 贵州咸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IV. ①F832. 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4471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责任校对 刘 娟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5
插 页 2
字 数 275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为了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充分发挥中国社会科学院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进一步推进理论创新，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水平，2006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实施“国情调研”项目。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经历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的国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从经济国情角度看，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我国经济实现了连续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我国已经具有庞大的经济总量，整体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到 2006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 209407 亿元，约合 2.67 亿美元，列世界第四位；我国经济结构也得到优化，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第一产业产值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27.9% 下降到 2006 年的 11.8%，第三产业产值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24.2% 上升到 2006 年的 39.5%；2006 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为 630.21 亿美元，列世界第四位，进出口总额达 1.76 亿美元，列世界第三位；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2006 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978 年的 343.4 元上升到 11759 元，恩格尔系数从 57.5% 下降到 35.8%，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 133.6 元上升到 3587 元，恩格尔系数从 67.7% 下降到 43%，人口城市化率从 1978 年的 17.92% 上升到 2006 年的 43.9% 以上。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引起国情的变化。我们的研究

表明,我国的经济国情已经逐渐从一个农业经济大国转变为一个工业经济大国。但是,这只是从总体上对我国经济国情的分析判断,还缺少对我国经济国情变化分析的微观基础。这需要对我国基层单位进行详细的分析研究。实际上,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由此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基本经验和基本工作方法。进行国情调研,也必须深入基层,只有深入基层,才能真正了解我国国情。

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组织了针对我国企业、乡镇和村庄三类基层单位的国情调研活动。据国家统计局的最近一次普查,到2005年底,我国有国营农场0.19万家,国有以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27.18万家,建筑业企业5.88万家;乡政府1.66万个,镇政府1.89万个,村民委员会64.01万个。这些基层单位是我国社会经济的细胞,是我国经济运行和社会进步的基础。要真正了解我国国情,必须对这些基层单位的构成要素、体制结构、运行机制以及生存发展状况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在国情调研的具体组织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组织的调研由我牵头,第一期安排了三个大的、长期的调研项目,分别是“中国企业调研”、“中国乡镇调研”和“中国村庄调研”。“中国乡镇调研”由刘树成同志和吴太昌同志具体负责,“中国村庄调研”由张晓山同志和蔡昉同志具体负责,“中国企业调研”由我和黄群慧同志具体负责。第一期项目时间为三年(2006—2008),每个项目至少选择30个调研对象。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这些调研活动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分别形成了《中国国情调研丛书·企业卷》、《中国国情调研丛书·乡镇卷》和《中国国情调研丛书·村庄卷》。今后这三个国情调研项目的调研成果,还会陆续收录到这三卷书中。我们期望,通过《中国国情调研丛书·企业卷》、《中国国情调研丛书·乡镇卷》和《中国国情调研丛书·村庄卷》这三卷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描述在21世纪初期工业化、市

场化、国际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我国企业、乡镇和村庄的发展变化。

国情调研是一个需要不断进行的过程，以后我们还会在第一期国情调研项目基础上将这三个国情调研项目滚动开展下去，全面持续地反映我国基层单位的发展变化，为国家的科学决策服务，为提高科研水平服务，为社会科学理论创新服务。《中国国情调研丛书·企业卷》、《中国国情调研丛书·乡镇卷》和《中国国情调研丛书·村庄卷》这三卷书也会在此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完善。

陈佳贵

2007 年 9 月

编者的话

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启动和实施“国情调研”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组织的调研第一期安排了三个大的长期调研项目，分别是“中国企业调研”、“中国乡镇调研”和“中国村庄调研”。第一期项目时间为三年（2006—2009），每个项目至少选择30个调研对象。

经济学部国情调研的村庄调研工作由农村发展研究所和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牵头，负责组织协调和从事一些基础性工作。农发所张晓山同志和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蔡昉同志总体负责，工作小组设在农发所科研处，项目资金由农发所财务统一管理。第一期项目（2006—2009）共选择30个村庄作为调研对象。2010年，在第一期国情调研村庄项目基础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又组织开展第二期国情调研村庄项目。第二期项目时间仍为三年（2010—2012），仍选择30个村庄作为调研对象。

农发所、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其他所的科研人员过去做了很多村庄调查，但是像这次这样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大规模、多点、多时期的调查还是很少见的。此次村庄调查的目的是以我国东中西部不同类型、社会经济发展各异的村庄为调查对象，对每个所调查的村庄撰写一部独立的书稿。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查阅村情历史资料等田野式调查方法，详尽反映村庄的农业生产、农村经济运行和农民生活的基本状况及其变化趋

势、农村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及其变化、乡村治理的现状与变化趋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与趋势、农村社会发展状况等问题。调研成果一方面旨在为更加深入地进行中国农村研究积累村情案例资料和数据库,另一方面旨在真实准确地反映 30 多年来中国农村经济变迁的深刻变化及存在的问题,为国家制定科学的农村发展战略决策提供更有效的服务。

为了圆满完成调查,达到系统翔实地掌握农村基层经济社会数据的预定目标,工作小组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项目选择、时间安排、问卷设计和调整、经费管理等各个方面。调查内容包括“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两部分,前者指各个课题组必须进行的基础性调查,这是今后进行比较研究和共享数据资源的基础;后者指各个课题组从自身研究兴趣偏好出发,在基础性调查之外进行的村庄专题研究。

使用统一的问卷,完成对一定数量农户的问卷调查和对调查村的问卷是基础性调查的主要内容,也是确保村庄调查在统一框架下开展、实现系统收集农村基本经济社会信息的主要途径。作为前期准备工作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问卷设计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后期分析和项目整体目标的实现。为此,2006 年 8 月初,农发所组织所里各方面专家设计出调查问卷的初稿,包括村调查问卷、调查村农户问卷等。其中,村问卷是针对调查村情况的详细调查,涉及村基本特征、土地情况、经济活动情况、社区基础设施与社会服务供给情况等 13 大类近 500 个指标;农户问卷是对抽样农户详细情况的调查,涉及户人口与就业信息、农户财产拥有与生活质量状况、教育、医疗及社会保障状况等 9 大类,也有近 500 个指标。按照计划,抽样方法是村总户数在 500 户以上的抽取 45 户,500 户以下的抽取 30 户。抽样方法是首先将全村农户按经济收入水平分为好、中、差三等份,然后在三组间平均分配抽取农户的数量,各组内随机抽取。问卷设计过程中,既考虑到与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对比的

需要，又吸取了所内科研人员和其他兄弟所科研人员多年来的村庄调查经验，并紧密结合当前新农村建设中显露出来的热点问题和重点问题。问卷初稿设计出来之后，农发所和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共同讨论修改，此后又就其中的每个细节与各课题组进行了集体或单独的讨论，历时半年，经过四五次较大修改之后，才定稿印刷，作为第一期村庄调研项目统一的农户基础问卷。

在第二期村庄调研项目启动之前，根据第一期调研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工作小组对村和农户问卷进行了修订，以更好地适应实际调研工作的需要。今后，还将随着农村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本着“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对问卷内容继续进行修订和完善。

在项目资金方面，由于实行统一的财务管理，农发所财务工作负担相对提高，同时也增加了管理的难度，工作小组也就此做了许多协调工作，保障了各分课题的顺利开展。

到2010年7月为止，第一期30个村庄调研已经结项23个；每个村庄调研形成一本独立的书稿，现已完成11部书稿，正在付梓印刷的5部。第一期村庄调查形成的数据库已经收入22个村1042户的基础数据。

国情调研村庄调查形成的数据库是各子课题组成员共同努力的成果。对数据库的使用，我们有以下规定：（1）数据库知识产权归集体所有。各子课题组及其成员，服务于子课题研究需要，可共享使用数据资料，并须在相关成果关于数据来源的说明中，统一注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村庄调查项目数据库”。（2）为保护被调查人权益，对数据库所有资料的使用应仅限于学术研究，不得用于商业及其他用途；也不得以任何形式传播、泄露受访者信息和隐私。（3）为保护课题组成员的集体知识产权和劳动成果，未经国情调研村庄调查项目总负责人同意和授权，任何人不得私自将数据库向课题组以外人员传播和应用。

国情调研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其中村

庄调研是国情调研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开展调研四年之后，我们回顾这项工作，感到对所选定村的人户调查如只进行一年，其重要性还显现得不够充分。如果在村调研经费中能拨出一部分专项经费用于跟踪调查，由参与调研的人员在调研过程中在当地物色相对稳定、素质较高、较认真负责的兼职调查员，在对这些人进行培训之后，请这些人此后在的年份按照村问卷和农户问卷对调查村和原有的被调查的农户开展跟踪调查，完成问卷的填写。坚持数年之后，这个数据库将更具价值。

在进行村调研的过程中，也可以考虑物色一些有代表性的村庄，与之建立长远的合作关系，使它们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村级调研基地。

衷心希望读者对村庄调研工作提出宝贵意见。也希望参与过村庄调研的同志能与大家分享他们的经验，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让我们共同努力，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

编者 2010年7月28日

前 言

我端上桌来，你们自己用菜：因为我的全部操劳仅仅针对着那些宣告我义务的事物。

——但丁

我们同意经济发展过程中许多方面的问题单凭经济学家有限的见识和微薄能力是无法应付和解决的，但是，我们不同意可以随意撇开那些经济学家觉得陌生但又是很必要的因素去研究经济发展问题。贫困乡村的落后与不发达，主要源于制度及人的因素造成的内部本身的全面紊乱。如果把经济的不发展等同于价格及其作用机制的形成，则是传统解释过于简单化的结果。事实上，远不止这些因素。农村商品经济运行载体——农户，以及生产经营组织尚未摆脱自然经济的束缚。按照人口平均国民生产总值衡量的“发展”，难以惠及全体人民的日常生活，诸如就业、收入分配和贫困状况的基本改善。换言之，“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只要还有60%—80%的贫困生活水平不但不能提高反而下降，那么这样的经济发展只能称为“有增长的无发展”。事实上，“现实的或者正在进行的研究，正在逐渐减少我们对于不发达的原因和人类中大部分人对所生活环境的无知，过去几十年间提出的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几乎可以肯

定，一俟更多的证据积累起来以后，将不得不予以扬弃”^①。

国情调查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新时期新阶段的重点任务和重大课题内容，其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毋庸置疑。因此，相关研究者纷纷起而行之、如火如荼。我们也有幸成为国情调查课题的一员，并承担了中国国情村庄调查——贵州省威宁县草海村的调研任务。

草海（行政）村位于云贵高原中部乌蒙山麓腹地、贵州省西北边缘、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草海镇西南部八公里处、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Caohai National Reserve）境内——黑颈鹤（*Grus Nigricollis*）故乡。草海村，一个具有中国西部典型特征的贫困村庄，不仅有着“自然资源保护与村寨经济发展”之特殊性，而且还是中国村寨发展信用基金（简称“村寨基金”）的发源地。因此，对草海村的调研、对草海村寨基金的调查剖析，势必具有相应的代表性和现实意义。

（一）

草海村地处自然保护区草海湖地带，村民聚居于草海湖岸，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和特殊。因此，草海村的生存、生产、生活和发展方方面面与草海保护区息息相关。正是草海村与草海保护区密切、不可分割的关系，调研草海村，必然要牵涉到与草海保护区直接相关的方面，如资源条件、社区环境、自然保护与村寨发展项目等。纵观有关草海及草海村寨基金的报告和文章，主要是从草海、草海保护区整体视角去考察分析其地理地貌、经济社会、文化状况和保护发展方面，而且不乏真知灼见和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为我们对草海村与草海村寨基金的调查研究奠定了基础。然而，在国情调查视野下，以草海村庄的生存、生产、生活和发展为重点，以村寨基金分析为核心，纳入农村金融实质问题框架内，应用剖析“麻

^① [美] 基思·格里芬：《可供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雀”的方式进行调查研究，本项调研报告尚属首例。况且，事实上存在着“调研者的视角、方法、广度和深度”的差异问题。由于人们看待问题的视角、判断事物的标准、价值观、所关注的问题层面、对象目标和调查方法有所不同，其调查深度和广度也会不尽相同，从而调查所得的数据结果和研究结论也可能迥然各异。

(二)

正确或客观理解社会现象是否牵涉研究者的价值判断、价值中立能否存在、是否可以直接用自然科学的理解模式和分析方法去研究经济社会现象等问题是长期争论不休、困扰着社会科学研究者

的问题，且由此引发出不同的社会研究学派（阮新邦，2000年），如韦伯（Max Weber）价值相关性理论、史蒂芬逊（C. L. Stevenson）情绪论（Emotivism）、哈尔（R. M. Hare）抉择论（Decisionism）、福特（Philipp. Foot）描述论（Descriptivism）、强价值介入论（The Strong Thesis of Value Involvement）、50年代的逻辑实证论（logical Positivism）、历史学派（Historical School）、自然学派（Natural School）、新康德学派（Neo-Kantian School），等等。由此可见，如何进行社会调查和研究分析是一个严肃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方法问题。

列宁说过：“凡是没有思维 and 概念的对象，就是一种表象或者甚至只是一种名称；只有在思维和概念的规定中，对象才是它本来的那样。”^①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认识道：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主要是由社会规范（socialnorm）及其语言符号、习俗、价值等元素构成的，倘若没有规范人类行为价值观的存在，也就不存在所谓的社会现象；社会现象并非如自然现象般的具有独立于人以外的客观存在的特质，而社会事实是一种“制度性事实”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42页。

(Institutional fact); 社会研究必然涉及研究者的价值判断或价值介入, 没有明确显示理解者的价值判断, 是不可能对人和现象获得较确切的理解的^①; 经验显然不可能穷尽复杂的社会世界, 只有经过研究者对调查研究对象的客观分析、价值判断和概念化过程才有可能达到本质的、普遍的和规律性的认识和把握^②; “调查员所赖以理解社会现象、收集和分析资料的语言, 并非纯然是一种从事研究的工具, 语言的使用本身部分构成其所要研究的现象”^③。那些所谓客观的实证研究, 其实就是一种经验常识的描绘……

此外, 关于现实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 由于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在体制和经济参数值方面迅速和断速的变化, 而且中国经济正处在各种参量不断变化和结构调整与转型的不确定阶段, 因此, 要为这个过程确定一种严格和定型的模式是不可能的。精确和严格固然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条件, 但与中肯恰当和切实可行相比则是第二位的。现实表明, 模式设计得越严格, 它的技术成就程度也就越高, 从而解释经济发展问题的能力也就会越差——这样的模式必然会过多地省略经济发展中十分重要的变量, 应用贯通的逻辑程序假设其约束条件, 规定目标函数为要点——经济学毕竟不是数学, 因为经济发展过程始终与历史变迁、人类行为、生存场景、思想意识、宗教信仰与创造力密切相关, 经济现实问题的研究正是缺乏确定理论和固定模式的研究。^④ 同理, 经济学不同于纯思辨的哲学, 因为经济发展中始终存在着人的力量无法驾驭的变量和因素。因此, 正如查尔斯·K. 威尔伯在《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所说的那样, “要探索经济发达和不发达的根源, 不应该从

① 参见阮新邦等主编《当代中国农村研究：理论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② 参见孙正聿《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

③ 阮新邦等主编：《当代中国农村研究：理论探索》，第33页。

④ 徐鲜梅：《中国西部地区：人与经济发展》，南京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3年，第5页。

一种高度概括和抽象的模式着手，只能建立一种能够说明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变量的不太严格但内容更为丰富的形式”^①。

依托实地调查、介入价值判断、贯穿逻辑分析、批判性地借鉴、历史经验提升是本项调研报告的主要方法，即村民问卷调查、农户深度访谈、重点人群座谈、机构现场观察、数据统计分析、典型案例研究、焦点问题讨论、经验体会交流、现象价值判断等**定量**实证分析与**定性**规范研究相结合。其中，生动事例、原始场境、真实素材、本真事件以及事实的内在联系性和数字包含的经济社会意义，是本项研究报告的“灵和肉”。

（三）

在调查中发现，草海村——一个较典型的中国西部贫困村庄，与全国其他村庄相比，不仅其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思想意识、市场发育程度及其村民生活水平有**差距**，而且其资源拥有状况、生产要素配置程度、生产率水平、经济资源条件、产业结构、产品市场状况、生产经营组织方式及社会化组织程度等所有方面均有**差异**——这是现实的必然，正如马克思和斯大林所指出的那样：“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②；“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这种或那种生产方式，因为每一辈新人开始生活时，他们就遇到现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即前辈人劳作的结果”^③。

在全国城乡经济与工农业统筹发展浪潮中，草海村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依然明显——一个是先进的或现代的（工业）部门，另一个是欠先进的或传统的（农业）部门。而且，草海村“二元结构”并

^① [美] 查尔斯·K. 威尔伯：《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1页。

^③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10月），见《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54页。

不像全国“二元结构”一样是一种“多元一次方程组”，不仅有解，且有多种解和最优解——这也正是城乡统筹与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可能性、空间和意义；草海村“二元结构”是一种“一元多次方程式”；本身“无解”——一面是资源富饶、组织程度较高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另一面却是一直挣扎在温饱线上、生存是其发展的全部意义的村庄。一面是公路、铁路、高速路四通八达；另一面是刀耕火种、广种薄收、人背马驮。一面是户均六口人；另一面却是人均五分地。一面是农业生产能力的严重不足；另一面却是农村劳动力的绝对过剩……

2008年草海全村生产总值597.3万元，其中，农业生产总值299.3万元、占50.1%，比全国11.3%的水平高出3.43倍；人均收入2000元左右，不到全国农民人均收入4761元的一半，比同年西部农民人均收入3382元还少1000元左右。在调查户中，人均收入水平在1500元以下的占28%，在1500—3000元的占19%，在3001—4500元的占11%，在4501—6000元的占3%，在9000元以上的占3%，低收入户人均收入水平1117.32元，比全国1500元的水平低25.5%，次低收入户人均收入水平2136.2元，比全国2935元的水平低27.2%，中等收入户人均收入水平3576.33元，比全国4203元的水平低14.9%，次高收入户人均收入水平4648.01元，比全国5929元的水平低21.6%，高收入户人均收入水平17228.89元，比全国11290元的水平高34.5%；全村粮食耕种面积2566亩，粮食总产量62.615万公斤，亩产244公斤，仅仅是全国亩产330公斤水平的73.9%，人均占有粮食151公斤；饮水来源主要是浅井水占68%，96%的农户使用旱厕；户均拥有房屋面积146.4平方米，人均拥有住房建筑面积25.96平方米，低于全国人均居住面积6.44平方米；房屋建筑类型主要是平房、占90%，其中，钢筋混凝土和砖（石）木房屋建筑结构占44%，低于全国农村农户钢筋混凝土和砖（石）木房屋建筑结构比重87.3%的43.3个百分点，

低于全国同期农村贫困农户钢筋混凝土和砖（石）木房屋建筑结构比重 65.7% 的 21.7 个百分点，砖混房屋建筑结构比重占 50%，竹草土坯及其他房屋建筑结构占 6%；户均住房价值 38767.35 元，人均住房价值 6808.60 元，低于全国农村农户人均住房价值 3983.20 元；2008 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2312.38 元，比全国同年 3661 元的水平少 1349 元、低 36.8%，比全国最低收入户 2145 元的水平多 167 元、高 7.8%，其中，食品、衣着、居住、家用设备、交通通信、文化娱乐、医疗服务和其他支出八项生活消费支出比分别为 50.7%、6.7%、18%、2.4%、5.2%、2.2%、11.1% 和 3.7%，恩格尔系数比全国 43.7% 的水平高出 7 个百分点，医疗费用支出水平高于全国 6.7% 的 4.4 个百分点，而文化娱乐和交通通信比全国分别低 6.4 个百分点和 4.6 个百分点；户均债务 10112 元，人均债务 1685 元。

土地是中国农村农民赖以生存、生活和发展的源泉和基础，土地是农业中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农民最基本、最重要的生产资料 and 经营载体，土地日趋成为小城镇、大城市周边村民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及其获取财富、迅速致富的重要路径，土地资源、土地市场越来越成为促进和调节经济社会及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手段。然而，在草海村，“土地”的重要性不在于其是否具有可分割性、可占有性及其市场交易价格和价值，而是在于它的极度稀缺性，以及严重影响到其村民的生存和发展。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全村共有耕地 2750 亩，人均耕地 0.96 亩，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全村共有耕地 2250 亩，减少了 500 亩，人均耕地 0.599 亩，农业税费调整后全村耕地又减少了 455 亩，只有 1795 亩，人均 0.451 亩，到 2008 年全村仅有耕地 1789 亩，人均 0.432 亩，大大低于人均 2 亩耕地能够维持基本生活需要的（水平）标准。

与资金不缺乏、金融资本市场较完善的村庄相比，草海村，土地资源匮乏、市场要素缺位、信贷意识弱、货币交易手段落后，尤